



世纪文库

知识分子的背叛

[法] 朱利安·班达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知识分子的背叛

〔法〕朱利安·班达 著 余碧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的背叛/[法]班达著;

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208-05165-8

I. 论... II. ①班... ②余... III. 知识分子—道德—研究—西方国家

IV. D75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4512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周运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知识分子的背叛

[法]朱利安·班达

余碧平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174,000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165-8/D·900

定价 19.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知识分子的背叛

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
的信仰而备受折磨。

——勒努维耶

目录

译者的话 /1

1946年版序言及其注释/5

关于知识分子的价值附录 /53

第一版序言 /60

第一章 政治激情在现时代的登峰造极。
政治的时代 /61

第二章 这一运动的意义。政治激情的本质 /74

第三章 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背叛 /78

第四章 总揽。预测 /144

注 释 /156

附录 朱利安·班达的理想主义 (T. S. 艾略特) /177

译者的话

《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是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 (Julien Benda, 1867—1956) 的代表作，也是一本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世界名著。全书分四章，集中讨论了“政治的时代”、“政治激情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背叛”等三大问题。从篇幅上看，比起同时代学人动辄数十万言的大作来，班达的这本书只能算是一篇论文罢了。不过，就在这本小书中，班达活脱脱地向我们展现了一幅 19 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后西方知识分子的心态史 (l'histoire de mentalité)。

我们知道，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民族国家和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的作祟而导致了一系列伤亡惨重的战争。其中，许多知识分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或打扮成青年导师和精神领袖，在教堂、课堂和公共传媒上鼓吹种族差异、民族至上和阶级对立，煽动普罗大众的“现实主义的激情”；或投笔从政，直接实践“现实主义的激情”。对于这一现象，班达斥之为“知识分子的背叛”，也即知识分子假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背叛了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和康德一样 (见《永久和平论》)，班达反对柏拉图的“哲学王”型知识分子，认为权力等世俗的政治利益会腐蚀知识分子判断的公正。他倡导的是以苏格拉底和耶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用抽象的公正、真理和理

性来批判现实。

对于知识分子的背叛，班达从三个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在第一章中，班达认为，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政治的时代”，其标志就是，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和民族的激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实，这些现实主义的政治激情以往也有，但都是一些情感的冲动和本能的自然爆发，从没像今天这样达到了组织化、合理化和普遍化的程度。而且“每种政治激情都备有一套结构谨严的学说，其惟一的作用就是为它的行为提供最高价值”。以往马基雅维里等人只敢把政治与道德区分开来，让政治玩自己的游戏；而今知识分子竟然给这些政治激情披上道德和科学的外衣。“今天所有政治激情都宣称它的运动符合‘进化的方向’、‘历史长远的发展’。……都宣称自己是有科学根据的，而且是‘对各种事实严格观察’的结果”。不过，知识分子的这种媚俗工作并非是一厢情愿。在第二章中，班达进一步分析了政治激情的本质及其心理基础。他指出：“这些激情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的意志：（1）群体摄取（或保有）世俗利益——领土、物质福利、暂处优势的政治权利——的意志；（2）群体自觉特殊、与众不同的意志。”前者是为了获得“利益”，后者是为了赢得“自尊”。这也符合个人追求利益和尊严的心理本能，因为个人总是希望自己所属的阶级、民族和种族最为强大。像巴雷斯、莫拉斯之流的知识分子恰恰迎合了这种心理要求，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和阶级意识，煽动群众对其他民族和敌对阶级的仇恨。在第三章中，班达分门别类地提出了不同形式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行径”，最后得出“促使知识分子变质的主要原因如下：把政治利益强加给所有的人；不断地给政治激情提供精神食粮；文人们介入政治活动的欲望和可能性；他们为了名利双收必然替日益不安的资产阶级效劳；通过与资产阶级联合而日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身份及其虚荣心；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的古代知识和精神操守严重下降”。最后，在第四章中，班达还对人类的未来做了一种预测。虽然现实主义政治激情会使各种族、民族和阶级之间为了追求利益和荣誉而互相残杀，但是人类也可能从战争中汲取教训，“不再

是互相残杀，而是互相和解，即共同拥有地球的善，因为各国和各阶级最终会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很好地利用地球”。不过，这并不一定就是人类的福音。如果人类继续坚持现实主义激情，那么“全人类就会团结成一支庞大的军队、一个巨大的工厂，它只知道有英雄主义、训练和发明，谴责一切自由的和脱俗的行动，不再把善置于现实世界之上，只为自己和自己的意愿，心中决无上帝”。

从《知识分子的背叛》发表至今，已有 70 年了。当我们回首这段历史，不能不说班达的预测极富教益。20 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政治时代”，无论是否情愿，人人都以阶级、民族和种族画地自限，相互对立。先是一战和二战，而后是长达半世纪的冷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终结了，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呢？无论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构想的“其乐融融的世界”，还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都未能超脱班达所批评的“现实主义”的窠臼。人类还可能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继续滑行，即使如福山所说，冷战后西方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模式将大行天下，昔日意识形态的敌人彼此握手言欢，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彻底庸俗化了，人类将会完全丧失崇高感和超越感。这也正是班达心中最大的忧虑。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的扉页上，班达还专门引用了勒努维耶的一句名言：“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

当然，班达的理想主义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像苏格拉底一样，班达也犯了把“善的知识”等同于“善的行为”的错误。换言之，坚持抽象的公正、理性和真理的观念并不一定带来行为的善，前者不是后者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苏格拉底理性伦理学的批评。记得有位主教在回答别人质询时曾说过：当有人打我的左脸时，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将会做什么。因而“善”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种选择的问题。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任何行为的善是指“要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境况，应该的关系，应该的目的，以应该的方式，这就是要在中间，这是最好的，它属于德性”（引

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1106b)。不过，这种实践智慧不是人可以轻易获得的，即使掌握了这种艺术的人，也难免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正是人类命运的悲剧性所在（有趣的是，在德文中，“Not”一词同时兼有“命运”和“悲惨”双重涵义）。因为，人总是在历史落幕之前（也许一开始）就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历史又恰恰是通过我们的选择得以实现自身的。因而，人类的选择必然没有充足的根据和理由，换言之，任何选择或多或少都是一种冒险和赌博，它使得错误和罪恶得以可能。对此，班达本人也无可奈何。虽然他一生都在弘扬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也曾在德雷福斯案中坚持正义，名噪一时，但是也难免“看走了眼”，竟在1949年为斯大林的大清洗活动辩护。

那么，如何规避苏格拉底的理想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主义的弊端呢？我以为，首先必须打破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化身或代言人这一传统信条。知识分子不可能垄断真理，比起俗人来，他们只不过是一批知识丰富、眼光敏锐和道德高尚的人。知识分子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也对自己的家乡和文化特别依恋。但是，知识分子与俗人的惟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理性批判精神，他们不仅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惟有通过这一理性批判，知识分子才能不断地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趋向永恒和普遍。

余碧平

初稿于1998年11月20日

修订于2003年8月

1946年版序言及其注释

这本书的出版已有 20 年了。其间，有许多读者多次要求我再版此 41 书。今天当我重新修订它时，我所坚持的论点——即我称之为以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变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已经为了实际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在我看来一点儿也没丧失其真实性，情况完全相反，他们彻底放弃追寻真理，而是完全背道而驰了。不过，知识分子背叛自身使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民族国家。在法国，著名者有巴雷斯 * 和莫拉斯 ** 今天，他们跟作为“附德分子”的法国人一样，干出了同样的丑事，尽管他们的动机完全不同，但都是蓄意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我想谈谈这种现象的新形式的几个主要方面。

* 巴雷斯 (1862—1923)，法国小说家、散文家。1889 年当选国会议员。他要求在个人、民族乡土、祖先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自我崇拜，于是从自我中心思想转到民族主义。1897 年到 1903 年发表了以《民族精力的小说》为主题的三部曲。——编者注

** 莫拉斯 (1868—1952)，法国作家。曾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45 年被撤销院士资格。他主张极端的民族主义，有着极端保守与复古的思想。在政治上，他是保皇党和法西斯的拥护者。1944 年法国在二战胜利后，莫拉斯被捕并判终身监禁。1952 年因病获释。主要著作有《三种政治思想：夏多布里昂、米什莱、圣伯夫》(1898)。——编者注

A. 知识分子以“秩序”之名背叛了他们的使命。他们的反民主主心的意义

第一个方面是他们以秩序之名进行的宣传，它被法国知识分子 20 年来不断地解释成对民主的反击。因为他们认为民主是祸乱的征兆。为此，他们在 2 月 6 日站了出来，鼓掌欢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认为它们是反民主主义的化身；同样，他们对西班牙的佛朗哥主义的态度也是如此。在慕尼黑事件中，他们反对自己国家为了巩固自身政体而甘冒风险，对德国人所作的挑衅进行了抵制（见注释 1）。对于法国的战
42 败，他们认为值得大唱赞歌，因为这总比维持一个令人痛恨的政体要好得多^[1]。但是战争爆发后，希特勒的胜利毁灭了他们的期盼，于是他们尴尬地收起了自己的希望；同时，他们又欢呼雀跃（见莫拉斯的《神圣的意外》）。总之，在所有这些知识分子之中，以秩序之名反对民主的运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定不移和目标明确（见《时代、曙光、法国人的言论》）。

这样一种表现现实是对知识分子价值的公然背叛，因为民主原则上是对这些价值的一种明确肯定，尤其是它尊重正义、人格和真理；不过，这里指的是民主在其遭受攻击者质疑的原则上是如此，而不涉及对它的不当应用^[2]。一切爱好自由精神的人们都认识到写在《人权宣言》或 1776 年的美国宣言上的政治理想清楚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不过，我们并不否认民主国家由于赋予个人以自由，会带来一种混乱的因素。孟德

[1] 关于这一点，请看 1938—1939 年间的报章集锦：《起义者、战争、我无处不在》。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些高论：“民主法国的胜利标志着文明的一大倒退”，“如果战争不应该让法国那肮脏的政体覆灭，那么它同样也会立即投降”；“我只希望带给法国一样东西：一场短暂的和灾难性的战争”；“我赞赏希特勒……是他消灭了民主，给历史带来了辉煌”（《我无处不在》，1944 年 7 月 28 日）。

[2] 请见下文，第 45 页（指法文原版的页码，以下皆同——译注）。

斯鸠就曾说过，“当你在一个国家里看不到任何冲突的结果时，你就可以确信这里没有自由”。他还说：“自由的政府就意味着总是麻烦不断”^[1]。相反，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里，由于它太重“秩序”，它不会把权利给予个人。或者，至少不会把权利给予属于某个阶级的个人。它只包括两类人；一类是统治者，另一类是被统治者。它的理想就是要强大而不要公正。那位建立罗马秩序的统治者在罗马的所有公共建筑物上刻有这样一段格言，他说：“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我的人民强大、繁荣、伟大和自由”^[2]。正义并不是刮一阵风，同样，秩序论者认为，社会各阶级已然确立，没有必要再来什么公正，如果下层阶级的人可以进入上层阶级，那么国家就会出现混乱。这就是莫拉斯之流推崇的“阶级不变性”的信条，它还被艾勒克斯·卡雷尔 * 博士涂上科学的保护色。他在《人的奥秘》一书中宣布，无产阶级的地位是**命定**（per oeternam）的，因为他们天生营养不良，即使后天进补，也是不可改变的。此外，注重秩序的国家，要求行事符合真理。不过，在它的全部法学家那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赞同这一价值的片言只语。在德·迈斯特那里没有，在博纳尔那里没有，在布尔热那里也没有，即使在他们当今的继承人那里也没有。相反，它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反对发扬光大各种精神要求和批评的观念，要求人们去“集体地”思考，换言之，根据维希政权的说法，也就是不要思考。这成为了我们许多知识分子的行为指南。《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作者要求：“我们不应该让年轻人的脑袋里装进太多无用的东西。”因此，体操课的考试要在年轻人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的成绩单上占有 50% 的分数，如果一位德国年轻人不能在三刻钟内不停地游泳，那么他就不能从三年级升入

* 卡雷尔（1873—1944），法国医生、实验生物学家。1912 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著作有《人的奥秘》（1935）和《对生命的见解》（1952）。——编者注

[1] 《罗马人的辉煌与没落》，VIII。

[2] 要理解这最后一个词，我们必须参阅同一位法学家的文章，即《意大利百科全书》中的“法西斯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在法西斯主义中，市民、公民拥有自由，但是仅仅是“**在整体之中并且通过整体**”才能拥有自由。这好比有人对士兵说，他拥有自由，因为他所属的军队可以做军队所想做的。其实，他（指这个士兵）连自己的每一个举止都不能控制。”

四年级^[1]。让秩序论者感到遗憾的是，维希政权的国民教育部部长阿贝尔·勃纳尔根据这一精神规定^[2]，我们应该向孩子们少教一些东西，老师在给孩子们打成绩的时候，要同等地看待他们的智力 and 他们的健康状况。《法兰西行动》* 杂志的思想家们要求崇尚所有的理智，但是，要求这一理智不能超出社会秩序许可的范围^[3]。此外，人们总是本能地认为，秩序的观念是与暴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为正义塑像，为自由塑像，为科学、艺术、慈善和平塑像，但是他们绝不⁴⁴为秩序塑像。我认为这很有说服力。同样，他们对“维持秩序”毫无同情心。“维持秩序”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意味着骑兵的枪弹向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群扫射，意味着妇女和儿童的尸体。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重建秩序”这句话所隐含的悲剧的意义。

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价值。崇拜秩序的知识分子已经背叛了他的使命。

秩序的观念是与战争的观念、人民悲惨处境 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与国联

我已经说过，注重秩序的国家只注重强大，而不在乎公正。还要再加上一点，它是战争所迫切需要的。由此，那些要求建立这样一种国家的人们，总是不停地呼喊国家所受到的威胁。40年来，《法兰西行动》杂志大喊大叫：“敌人已临国门，现在是要服从，而不是要进行社会改

* 《法兰西行动》是1899年莫拉斯与人一起发起组织的。又于1908年与雷翁·都德一起把原为周刊的《法兰西行动》办成日报。它在一战前后得到了包括教士、职员、工人等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其中不乏诗人、作家等所谓知识分子。《法兰西行动》事件的本质便是一个民族主义是否是最高层面概念的问题。在一战前后他们之所以能吸引许多法国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编者注

[1] 请参见A·德·梅厄斯：《阐释现实德国》，Marechal，第97页。

[2] 参阅他1942年的报告。

[3] 请看下文第182页。